

●新作点评

新排《原野》:解读与创新的偏离

□田本相



陈薪伊导演话剧《原野》

《原野》演成情爱恩仇式的通俗故事,四是拟给《原野》以新的解读、新的面貌的演出,这其中包括带有争议的李六乙导演的《原野》,也有受到好评的王延松导演的《原野》。

新版《原野》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人们自然可以有所比较和议论了。

陈薪伊导演是试图创新的。在她的《导演阐述》中可以看到她对《原野》的解读和她试图出新的思路。她对于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解读《原野》的做法是很不满意的。较之以往的《原野》演出,她在解读上有自己的见解:

首先,在关于《原野》的“总体艺术形象”的构思上是别出心裁的:“人是会思考的芦苇”,在舞台上,我要求有一亿根芦苇。”这是她得意的地方。于是,当大幕打开时,芦苇充满了舞台,尤其是在灯光下,芦苇闪烁着,显得格外的明亮。这样一个总体形象是前所未见的,是导演的独造。

其次,在解读焦、仇两家的关系上,导演更是另有新解。在她看来,“其实,仇虎和焦家是同样经济地位的两个家庭”,“假如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复仇就合理吗?”

接着,在艺术处理上,导演增加了大量的音乐。不仅是伴乐,而且写了五首歌,包括专为焦母创作的摇篮曲。希望透过音乐“把人的厚度和丰满性表现出来”。这都有别于以往《原野》的舞台演出。

最后,在处理主人公仇虎的死上,导演也有独到的方法。原著是在仇虎和金子逃到林子里,在侦缉队的包围中,仇虎不幸中弹负伤,只好让金子逃走,然后开枪自尽。现在的处理是:在没有侦缉队的包围和枪击仇虎的情况下,仇虎主动自尽。

在该剧演出期间,我有意听取了一些观众的反映,部分观众对导演的某些处理抱有不同意见,认为新版《原野》与原著无论在思想主题、人物解读和艺术处理上都有距离,的确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第一,就《原野》总体形象来说,与新版《原野》反差较大。原著里展开的“原野”是沉郁的、昏黑的、诡秘的,这样一个压抑的氛围似乎用“黑林子”更恰当。如果导演要改造“总体形象”,那么,势必提出人物的、故事的、甚至戏剧场景的新逻辑。在基本故事依然是沿用原著的情况下,这样一个“芦苇意象”就成为与故事缺乏有机联系的附加物,好像是硬“罩”上去的。

第二,导演在不赞成以阶级斗争为纲解读《原野》的前提下,提出仇虎报仇是否合理的问题。这关涉对《原野》主题的理解,曹禺先生对此有过解释,他是这样说的:

《原野》不是一部以复仇为主题的作品,它是要暴露受尽封建压迫的农民的一生和逐渐觉醒。仇虎有一颗火一样复仇的心。剧中像焦、王那种人……这些人两手沾满杀人的鲜血,跑回老家去,用抢来的和贪污官饷的钱,买地置产业。他们还有他们的马匹、卫兵,有些武装就在家乡为非作歹,称霸一方。农村就是他们的小天下。”

显然,仇虎报仇是有他的理由的,也就是说报仇是合理的。《原野》写的是复仇,但不止于复仇,其重点不在于讨仇虎复仇是否合理,而在乎揭示“父仇子报”这样一个古老的意识是怎样纠缠着仇虎的灵魂,又怎样扭曲着仇虎的人性。在曹禺看来,仇虎一颗火一样的复仇的心,是一颗为毒焰燃烧的心,于是陷入了走火入魔的非人的状态。

在第三幕第一景中,曹禺写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话,长期地为人们忽略了,在曹禺看来,杀完大星之后,逃到黑林子里,此刻的仇虎才显示出“真人”的本性。

希望,追忆,恐怖连续不断地袭击他的想象,使他的幻觉突然异乎常态地活动起来。在黑的原野里,我们寻不出他一丝的‘丑’,反之,逐渐发现他是美的,值得人的高贵的同情。他代表一种被重重压迫的真人,在林中重演他所遭受的不公。在序幕中那种狡恶、机诈的性质逐渐消失,正如焦花氏在这半夜的折磨里由对仇虎的肉体的爱恋而升华为灵性的。”

这段话表明曹禺在《原野》里,尤其第三幕是怎样地深入人的灵魂深处,又是怎样运用他的艺术,将人的灵魂化为舞台的动作和舞台形象的。

第三,一个表现主义的戏,尤其是话剧,人物灵魂的自我搏斗,它的富有寓意和

韵味的象征性,都是靠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来展现的。新版《原野》在艺术处理上,一是满台的芦苇,几乎淹没了人物的动作和语言,损失了话剧艺术的特性和魅力,所有人物都不得不过度地喊话;二是大量的音乐也在损失话剧的魅力。尤其是那首牛头马面的歌,全然摒弃原有的民间小调,创造出来的是首不能符合剧情的歌唱。在这里,音乐干扰了叙事,使得曹禺深厚的文学营造变得肤浅。不准确的视听创新导致了不准确的人物塑造。

我赞成曹禺戏剧的演出,应该有一个新的面貌、新的创造。但是,以我的观察,要达到创新的目的,是否应考虑以下两点:

一是曹禺戏剧舞台的创新,应当从曹禺的剧作中去寻找新的意蕴、新的思路、新的手法。在我看来,一切皆以导演对曹禺剧本的解读为转移。譬如解读的态度,解读的细度和深度,尤其是解读的发现和创意。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所有导演大师,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于契诃夫的剧作,焦菊隐对郭沫若、老舍的剧作等,都是在高度重视对文本的解读中才完成他们的舞台创造的,甚至由此形成他们的导演体系。剧本,在我看来,依然是导演创新之源。当然,这种看法是对后现代那种否定经典、任意解构经典的做法持反对态度。

二是适度原则。当你准备在导演曹禺的戏剧中有所创新时,你应当遵守适度的原则——历史适度、观众适度、环境适度、艺术适度。

历史适度是一个对待传统的问题,创新必然反传统,创新就是对传统的创新。但是,反传统要适度,这是一个明智的导演必须考量的。一旦反得过头,那么势得其反。观众适度就是要考虑你所面对的观众的审美习惯、审美需求和审美程度,否则,不是对牛弹琴,就是牛自弹琴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大师,既不低估观众,也绝不迁就观众,更不该“忽悠”观众,以假充真。环境适度就是你的创新必须考虑到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环境,譬如文化艺术的潮流等等。艺术适度是当你考虑到以上原则后,落实到艺术上,在方式和手法上的创新。艺术的创新关键在于把握分寸,最美的、最艺术的,必然是最适度的、最讲究分寸的。这几点都构成对艺术家的考验。

《新安家族》彰显徽商精神



本报讯 电视剧《新安家族》以清末民初民族资本的崛起、发展壮大为背景,以徽商汪、许、鲍三大家族为争取民族自强而与外国列强资本展开殊死的较量为主要线索,再现了上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经济波澜壮阔的风云变幻,通过三代徽商的坎坷与辉煌的悲壮历程,展示了徽州经商济世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最近该剧已制作完成,将与观众见面。

该剧叙事结构的核心是以汪家为代表的徽商群体,在与外国列强资本的较量中,为争取商业公平权和民族大义而付出艰苦卓绝的奋力抗争,歌颂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徽商为家庭、为爱情、为事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大义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伟大时代精神;弘扬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积淀的深厚文化底蕴,展示着中国古代徽商传承中华文明而建立起来的传统经营理念、睿智的经商之道和用人之道。剧情跌宕起伏,一波三折,被认为是“一个百年家族的传奇,一部徽商精神的史诗”。据悉,全剧共47集,央视一套播出版为39集,47集版将在第二轮播出时展现。

(晓文)

王一兵音乐会演绎晋之韵

本报讯(记者 王冕) “晋韵——王一兵个人作品音乐会”11月6日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当晚,王一兵向观众奉献多首浸润着清新晋韵之风的原创作品。

王一兵现任山西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多年来她始终坚持音乐创作,已创作了各种题材和体裁的音乐作品近千首,并出版了自己的歌曲集《献给祖国的歌》。她的作品《海那边,海这边》《故乡酒》《走向新辉煌》等曾获山西省优秀歌曲比赛一等奖和山西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此次举办的音乐会是对王一兵多年创作成果的一次全面展示。音乐会上半场为声乐作品,包括独唱、对唱、合唱等形式和通俗、民族、美声等唱法,有《普通士兵》《夫妻是条船》等反映普通百姓生活情感的作品。下半场为器乐作品,其中管弦乐作品《山西民歌六首》都是西北风情十分浓郁的民歌。

此次音乐会由总政歌舞团演奏,指挥家李玉宁执棒,王丽达、杨九红、于爽、宋立忠、冯瑞丽等演唱。

浙江工艺美术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 由中国工艺美术馆主办、浙江省民间美术家协会和浙江嘉瀚艺术品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学术巡展——浙江工艺美术”展览,日前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中心区中国工艺美术馆临时展馆举行。浙江一直是中国传统手工艺的重镇,这次展出的近百件作品包括龙泉青瓷、青田石雕、黄杨木雕等传统深厚、技艺精湛、境界独到的经典工艺美术品类,均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此外,还展出了新开发的金丝楠木家具,该项目用料、行工极为考究,发扬了以典雅为尚的中国传统家具风格。此次展览既有工艺美术大师的精品,也有中青年从艺者的佳作,从中可见当代浙江工艺美术创作的水平和面貌。

(艺文)

韩国艺术家尹明老画展突显传统与现代完美的融合



本报讯 韩国当代知名艺术家尹明老画展近日在中国美术馆与观众见面,此次展出了他近十年来创作的24件精品,系统的展示了他近年来的创作心路和艺术风格。

尹明老1936年出生于韩国,1960年毕业于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他的作品被大英博物馆等20余家著名公共美术馆收藏。尹明老是上世纪60年代韩国抽象艺术运动的带头人。经过40年来对不同风格的实践与挑战之后,他回归到对东方传统艺术的深刻领悟。在他那粗细不一的笔调和墨迹交织的绘画中,完美地把传统与现代融合在一起,精细但不失气势。他的作品,远看像中国山水画,近看却是一幅抽象画。

(任晶晶)

艺术院校研讨政治教学如何贴近学生思想实际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科研水平,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培养新世纪艺术人才中的重要作用,全国艺术院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讨会日前在中国戏曲学院举行。来自全国28所艺术院校的近60名学者共聚一堂,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借鉴、网络文化与艺术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共性与个性探讨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与会代表认为,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一定要贴近当下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正视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热点与难点,关注新世纪大学生的所思所想,找准科学理论教育与艺术人才成长的结合点,在满足艺术人才成长的基础上,实现思想政治理论的价值。

(萧倩)

●关注

电影界人士批评浮躁现象

本报记者 任晶晶

“我们在肯定中国电影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不能不看到仍存在着严重的浮躁现象。”近日,在中国影协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暨影视创作座谈会上,电影艺术家翟俊杰态度鲜明地指出了当下中国电影需要改善的不合理状况。

翟俊杰表示,对于金钱和名利的追逐使得影视工作者很难静心创作,“现在都说要娱乐,我觉得这点没有错,人们辛勤劳作了一天,需要休闲和开心,这没有什么指责的。但是创作者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娱乐不代表粗俗,好玩不能代替好看,不能为了金钱,就忘记高雅”。

“对于名利的崇拜使得中国电影和电视剧的制作出现了严重倾斜。”导演冯小宁认为,明星酬金暴涨的不良现象就是中国电影对票房的高度倾斜所造成的。他算了一笔账:一部中等成本的电影,如想启用明星,仅酬金就能达到总成本的50%以上。如果再刨去宣传等费用,仅供拍片的资金就所剩无几了。“在金钱的刺激下,所有的影视剧都围着这些明星,明星们怎么可能不浮躁,怎么可能有充足的时间琢磨角色?其次,让生活亦如贵族的明星们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谈何容易。”

老艺术家杨在葆也深表赞同,他说:“别人经常问我为什么现在不演戏、也不导戏了。我的回答是,我在经济大潮中是败将,只能从商业大潮中败退了。”他表示,自己对于目前的创作环境看不懂、很困惑,“我们那时拍戏自己带行李、带粮票和钱,1961年,我到山东的烈士陵园去拍《红色娘子军》,烈士陵园没有房间,也没有床,我们就铺上稻草在地上睡,虽然很辛苦,但是大家干得特别起劲。我们当时所追求的就是在电影中塑造的角色能被观众肯定。”

一直坚守于民族电影创作的麦丽丝导演坦言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困惑和迷茫。如今,她已认定,自己不需要那些虚假的、泡沫的票房,也不会因为金钱的诱惑而去拍浮躁的电影,“我宁愿让个别的少数人去看,看完了觉得你还在坚守着对文化和电影的一些思考,我觉得也就够了”。

评论家李道新认为克服浮躁的心态对于从事影视理论与批评的学者来说也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对优秀的电影文化传统还缺乏足够的尊重和张扬。”他举例香港国际电影节,每次都会举办对香港电影历史的一些研讨,在香港电影人看来这就是香港的骄傲所在,就是香港的文化传统和电影的精髓。李道新认为,只有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我们才能更多地去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让我们整个的老一代电影人曾经的精神、曾经的创造,能够作为一种优秀资源对当下的中国电影有所触动,这也会形成好的、良性的电影生态和文化氛围,对于当下的电影的创作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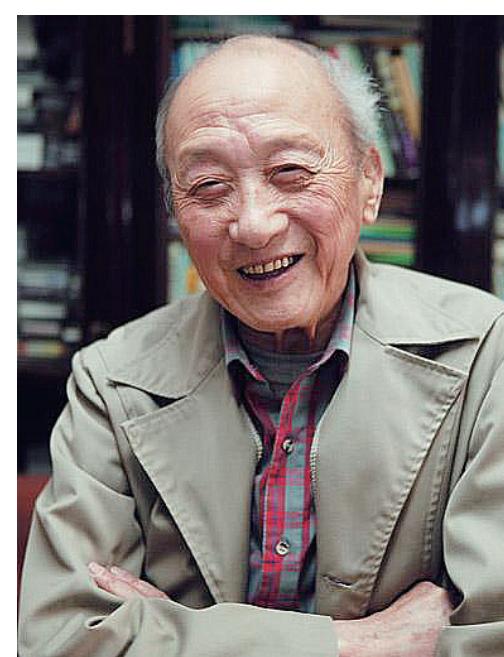
针对一线电影工作者们提出的种种问题,参加座谈会的饶曙光、陆绍阳、赵卫防、梁明等影视理论、评论家们也从学理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建议。他们认为,要尽快调整电影产业的利益分配格局,适当向制片发行和编剧倾斜。还要重视转变电影的发展方式,要从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迈进。比如好莱坞的一些杰出导演,他们不仅是电影艺术家也是电影工业的推动者,我们中国的导演就缺少这方面的自觉。针对明星酬金飞涨的现象,专家们建议电影工作者可以转移视线,聚焦高科技电影的发展,像《阿凡达》就没有启用明星。

●追忆

“问心无愧,笑着回”

——送黄宗江先生乘鹤西归

□胡志挥



黄宗江先生是我所剩无多的一位老大哥、老朋友。我们俩一见面,可以说推心置腹,无话不谈。2008年春,应邀聚餐,先生还劝我说:“人生最可贵的是问心无愧,哭着来,笑着回。”正是由于常怀这种乐观、豁达的心态,先生直至最近,仍笔耕不辍。因此,当一听到广播里的噩耗,真是晴天霹雳。

黄宗江先生不仅文化程度高,人缘好,而且经历和建树也很突出。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上台演戏,编写剧本,而且先后扶掖了不少后辈。例如,知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的出山就是一个实例。此外,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他对我国电影事业发展的贡献也是十分巨大的。只要一提《柳堡的故事》和《农奴》,无不称赞。

我有幸结识这位杰出话剧、电影艺术家,全赖1945年冬电影《清宫秘史》的编导姚克先生的推荐。姚克先生的英语很好,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开始把曹禺的成名作《雷雨》译成英文。不久,因向国外介绍我国昆曲的发展历史和研究李贺的诗选,他经常登门向族公胡吉宣(1895—1984,著名训诂学家)讨教。抗日胜利后,我考入上海美基洋行做练习生,颇想尽早学好英语,实现乃翁要把灿烂中华文化弘扬出去的

宏愿。为了使我早日成才,族公拜托姚克先生辅导我学好英语。记得,那天出门后,他便立即带我到美国新闻处,送我两本由那里馈赠的英文书《战地钟声》和《法兰克林传》。自那时起,我常到一家影坛人士云集的咖啡馆去向他请教。在那里,我结识了宗江大哥。他当时正组班搞话剧,曾送票请我到金城大戏院去看演出。

改革开放初期,我转入《中国文学》英文版工作。英籍专家白霞跟他很熟。有一天,她得悉我认识黄宗江,就派我去他家送材料。那天,正好孙道临也在那里,我们久别重逢,谈得非常欢畅。从此,我们又开始了新的交往。他曾请我观赏他根据美国剧作家奥尼尔改编的剧本等等。然而,由于各自都很繁忙,接触尚不多。

2008年春,英籍专家白霞随丈夫(曾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来京讲学。自那时起,她经常宴请以往的同事和好友,我们见面畅谈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由于宗江大哥见多识广,每次见面,大家都会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他呢,也总是有求必应,滔滔不绝。例如,有人不知重庆“二流堂”的典故,他竟能从“唐瑜”是何许人,一直讲解到郭沫若说:“延安1942年开展大生产运动,改造二流子,你们这些人(指吴祖光等许多进步文化人)活像二流子,就称作二流堂吧。”讲得十分到家。又如,有人打听表演艺术家金山的趣闻,他也会从重庆上演郭沫若的话剧《屈原》,讲到他和张瑞芳的婚恋,甚至还讲述后来的各种经历,真是活灵活现。再如,有人问他电影演员上官云珠的生平,他也同样讲得有声有色,十分感人。他总是有问必答,能不夸他是话剧、电影界的一部活词典吗?

2006年春,我应邀撰写一篇纪念姚克的文章,没等我开口,他就主动向我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文章发表以后,他还向我讲述了许多有关的回忆。有一次,他说:全国解放后去姚克家拜访,此时他们俩已离婚,男的去了香港;女的一在家。当时,碰巧宗江大哥多天没刮胡子,结果,还是上官云珠寻找出姚克留下的一把剃须刀,才让他刮了胡子。他一边讲,一边笑,真是有声有色,犹如昨日一般。到了晚年,尽管早已硕果累累、德高望重,但不论对同辈或小辈,宗江大哥依然热情、周到,有求必应。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好心总有好报。”走得那么快,不正是他自己所推崇的“哭着来,笑着回”吗?如今,宗江大哥,你既乘鹤西归,此时此刻,想必已与尊夫人及那些好友们欢聚一堂了吧。祝愿你们永远含笑九泉!